

► 一批最具创新力的
经济学家的倾情奉献

► 透彻分析经济学各
分支学科的最新发展

► 展现了经济学与金
融学演进的未来方向

经济学新前沿

New Frontiers in Economics

[美] 迈克尔·曾伯格
Michael Szenberg 编
拉尔·兰姆拉坦
Lall Ramrattan

► 一批最具创新力的
经济学家的倾情奉献

► 透彻分析经济学各
分支学科的最新发展

► 展现了经济学与金
融学演进的未来方向

经济学新前沿

New Frontiers in Economics

迈克尔·曾伯格
Michael Szenberg 编
[美] 拉尔·兰姆拉坦
Lall Ramrattan

李涛 张成思 张文春 郭庆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新前沿 / (美) 曾伯格, 兰姆拉坦编; 李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0614-4

I. 经…

II. ①曾…②兰…③李…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071 号

经济学新前沿

[美] 迈克尔·曾伯格 编
拉尔·兰姆拉坦
李涛 张成思 张文春 郭庆旺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4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萨拉 (Sara)、父亲荷诺奇 (Henoch) 和我的妹妹埃丝特 (Esther)，是他们验证了以下箴言：

幸福属于那些找到智慧的人们

幸福比珠宝更珍贵

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幸福相比

幸福的道路铺满欢欣

幸福的路程充满祥和

献给我的长子纳奥米 (Naomi) 和我最小的孙子雅各布 (Jacob)

献给我的爱妻诺拉娜·兰姆拉坦 (Noreena Ramrattan)

献给我的孩子们——德维 (Devi) 和她的丈夫阿尔俊 (Arjun)、尚提 (Shanti)、哈里 (Hari) 和拉尼 (Rani) 以及我的孙子——索哈姆 (Soham) 和拉克斯米 (Lakshmi)

关键不在于我们想什么，而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

——杰尔姆·威斯纳 (Jerome Wiesner)

作者名单

科依勒·贝格威尔 (Kyle Bagw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彼得·博萨尔茨 (Peter Bossaerts) 加州理工学院威廉·哈克经济学
与管理学教授

约翰·Y·坎贝尔 (John Y. Campbell) 哈佛大学奥托·爱克斯坦应
用经济学教授

米歇尔·R·加芬克尔 (Michelle R. Garfinkel) 加州大学艾尔文分校
经济学教授

佩里·梅林 (Perry Mehrling) 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
授

詹姆斯·波特巴 (James Poterba) 麻省理工学院三井财政学和公司财
务教授

马修·拉宾 (Matthew Rabi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G. 爱德华和南
西·约丹经济学教授

德布拉吉·瑞 (Debraj Ray) 纽约大学优利斯经济学教授

斯泰吉奥斯·斯卡珀达斯 (Stergios Skaperdas)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
济学副教授

罗伯特·W·斯泰格尔 (Robert W. Staiger) 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
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艾伦·O·赛克斯 (Alan O. Sykes)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课程主任和弗
兰克与伯尼斯·格林伯格法学教授

致 谢

本书的问世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资深经济学编辑斯科特·帕里斯（Scott Parris）的智慧结晶。在 ASSA 会议间歇，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回应了他计划出版本书的这个想法。接着，在一张餐巾上我们就很快拟出了可能的候选作者名单。我们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帕里斯对本书的策划，他组织了四位审稿人和两个编辑委员会来指导本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英国。没有任何作者能从编辑那里得到这么多的支持，或者找到更好的出版社了。剑桥大学出版社以质量和对出版书目的严格要求而闻名于世。本书的完成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请我的合作者拉尔·兰姆拉坦（Lall Ramratlan）加盟作为本书的主编。此书的许多文章最初登在我担任主编的《美国经济学家》（*American Economist*）杂志上，在本书重印时做了修改。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协助，受益匪浅。最应该感谢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他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并毫不迟疑地同意为本书写了序。当然，我们也感谢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他们的合作使主编工作成为一件愉悦的事情。我们感谢这些作者的无私合作精神。

另外，我还要感谢四位匿名审稿人和两个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对本书给予了热情支持并提出了启发性的建议。本书从初稿到终稿的编写，得到了 Abraham Goldstein, Diana Ward 和 Gary Yohe 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从与鲁宾商学院（Lubin）金融和经济系的合作和深厚友谊中受益良多，他们是 Lew Altfest, William C. Freund, Surendra Kaushik, Matt Morey, Jouahn Nam, Joseph Salerno, P. V. Viswanath, 国际金融中心的主任 Berry Wilson, Jorge Pinto, 两位负责学术的副院长 Peter Hoefer 和 James Russell。我要特别感谢 Aron Gottesman, 他的许多深邃评论和编校工作对本书的最终成稿有巨大的提高作用。我们同时深深感谢鲁宾商学院的副院长 Lynette Wailoo 的热情周到和学术支持。

鲁宾商学院应用研究中心有着充满同志般情谊的氛围。在过去四年中，这些友情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同时要感谢我以前的助手 Iulie Ismailescu, 她不仅做事认真，而且聪明睿智，现任鲁宾商学院助

理教授，正在攻读马萨诸塞大学金融学博士。我过去几年的研究生助手 Ester Budek, Priya Hariani, Scott Hinman, Richard Nilsen 和 Justyna Tuniewicz, 使我们的研究中心成为团结互助的地方，是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协助我完成了这个项目和大量的其他项目。我对他们的慷慨无私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另外，如果我们不对下列人员的信任、宽容与协助表示感谢的话，那么我们的致谢名单是不完整的。这些人包括金融系的总协调人 Carmen Urma, 应用研究中心的秘书 Nicola Simpson 和该中心的编辑助理 Andrea Pascarelli。

我们还要对经济学荣誉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大力支持表示特别的感激与致谢。他们是 Mary Ellen Benedict, James Bradley, Jr., Stanley L. Brue, Kristine L. Chase, Robert R. Ebert, William D. Gunther, Shirley Johnson-Lans, Charles F. Phillips, Jr. 和 Robert S. Rycroft。

著作成书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的合作主编拉尔·兰姆拉坦与我分担此项工作。与此同时，我正担任鲁宾商学院经济和金融系主任，正面对着全系转型的新挑战。要使一个拥有 50 多名教员并且其中许多人具有终身教职的学术研究部门获得如此成功，就如同重新建立一个雇用几千人的组织那样富有挑战性。这真是难得的宝贵经验！拉尔真的是很棒的，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支持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佩斯大学鲁宾商学院的院长 Arthur L. Centonze, 感谢他的睿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多方面的鼓励。对上述所有人的感激之情，让我内心涌起阵阵暖流。

在本书即将完成时，我的母亲萨拉·曾伯格 (Sara Szenberg) 去世了。她智慧非凡，以钢铁般的毅力和天鹅绒般的温柔造就了和谐美满的婚姻。她不仅仅知道要说什么，而且更知道如何讲出来。她谆谆教诲我们：聪明的人知道要讲什么，但是睿智的人知道如何讲出来。我经常会想起她。

我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孩子：纳奥米、阿维和他们的配偶马尔克 (Marc) 和托瓦 (Tova)，还有我的孙子们：爱尔基 (Elki)、巴塔 (Batya)、查诺奇 (Chanoch)、德沃拉 (Devora)、阿亚拉 (Ayala) 和雅各布 (Jacob)。他们给予了我夫人和我精神鼓励，他们是令人愉悦的礼物，也是对我们夫妇的祝福。

萨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这位伦敦 18 世纪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完成了准备出版词典的辛苦工作后，连 18 世纪的印刷机都为之感叹：“感谢上帝，我终于和约翰逊一起完成了任务！”我希望上面提到

的这些人对本书不曾有过同样的感慨。

迈克尔·曾伯格 (M. S.)

我的家人对我一直非常耐心。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一项目中的。我衷心感谢他们为我努力完成此书而远离家庭所给予的耐心。

我要感谢那个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让我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的人。他就是我去世的哥哥苏鲁吉·拉坦 (Suruj Rattan)。他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能对经济学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一个人。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参与本书的工作肯定要回溯到他对我的影响。我同样要感谢我母亲，感谢她在精神和学术上给我的鼓励。她为我讲授了经济学的第一课：“贫困就是犯罪”。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们关注着我完成了学业。

我能与迈克 (Mike) 合作出版本书感到非常自豪。他不仅智慧过人，而且心胸开阔。他为人宽宏大度，就像兄长一样呵护着我，帮助我解决了审稿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我希望当我说此书真的是奉献给他的时候，他会理解我的心意。

拉尔·兰姆拉坦 (L. R.)

序：监听未来？

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无论是历史学、经济学、天体物理学还是免疫学，都处于不停的动态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在曲折中前进。学术圈里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充满自信，或者带有自尊和自满的情绪。当刚刚过去的成就看起来已经相当成功，而前方仍有隐约可见的可以完成的任务时，我们这些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人就是最幸福的。

每一代人的本性都非常相近。我们每个人都想在各自的学科留下我们与众不同的名字——完成我们前辈教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但（如果可能）需要通过改进他们已经过时的成就。这样就可能出现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即当一门科学处于康德拉捷夫长波理论的最高峰的时候，对该科学的不满足却会滋生。早就有人说：“牛顿做了所有的事情。当欧洲大陆的数学家如欧拉（Euler）、伯努利（Bernoullis）、拉格朗日（Lagrange）和拉普拉斯（Laplace）开始觉醒的时候，英国的数学已经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凯恩斯的耀眼光芒笼罩了牛津剑桥。因为大自然不喜欢真空，这就给我们这一代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的希特勒难民——一个机遇，使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如今，每个阶段的教材——初级、中级和高级——都非常相似。曾几何时，在麦迪逊、奥斯汀和伯克利所学到的经济学，可能与在芝加哥或剑桥所学到的完全不同。但是，现在这样的差别就不存在了。

这样的情况使少数人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想方设法避开严格审稿的期刊，聚集起来在另外一些经济学书本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的地下室就是这样一个见证。在20世纪20年代，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就编辑了这样一个合集，收录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然而，等我去世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再会记起这件事情。

这里我提一点建议，当你困惑时，请回想一下我这里提出的新建议。许多人觉得凡事要从头开始，到最后很少有人会关注他们付出的努力。但是，持肯定态度的人要比总爱唱反调的人带来的危害小，因为达尔文的逆向测试过程可以及时地（最有可能的？）将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东西，以及浅

薄的与深刻的事物分离开来。

我不止一次地讲述近期新学派学者汉斯·内塞尔 (Hans Neisser) 在他临终时告诉我的话。他说：“我的移民朋友雅各布·马尔沙克 (Jacob Marschak) 是对的，我是错的。当每一个创新——博弈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计量识别——过程出现的时候，他都热情地拥抱这一切，甚至是过度热情。我却退缩不前，担心那些创新中存在漏洞。最后，问题还是会或多或少地被解决，而那些思维开阔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更多的快乐，并且确实加速了问题的解决进程。”

可能我应该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见的陷阱：你可能常听自己说：“这不是新的，那也不是新的。”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曾经提出：“第一次真正说出新事物的人从来不会说这是新的。” 每一代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偏好。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像索洛 (Solow)、莫迪利亚尼 (Modigliani) 以及我本人那样，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新新凯恩斯主义者”，甚至是“反凯恩斯主义者”。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他们的作品和观点与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学的宏观经济学相差甚远，而且他们信念中的共同核心内容也与哈罗德 (Harrod)、希克斯 (Hicks) 和汉森 (Hansen) 从凯恩斯学说中精炼出来的 IS—LM 图解有天壤之别。

我的耳边又回响起我母亲曾经说过的话，在这里与本书的读者共勉：尝试新事物吧，这可能让你受益终身。

保罗·A·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前言

本书的重点是强调经济学分支学科中新方向的重要性。本书的内容，即 10 篇文章，从非常宽广的视角审视经济学领域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当然，本书也可能存在疏漏，而且我们选择的文章不能满足每一位读者。我们从创业角度出发，说服了一些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请他们就他们的研究领域正在发生变化的方向撰写论文。这些作者们可以自由决定写作手法，尽管我们要求他们尽可能减少数理内容，尽量避免数学推导，而更多地采取描述性写法，从而尽可能地扩大读者对象的范围。我们发现没有必要使用文章长度作为核心标准来衡量各个研究领域在本书中是否有均衡的展示。

New Frontiers in Economics/by Michael Szenberg, Lall Ramrattan

ISBN: 0-521-83686-7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目 录

导论	1
----------	---

第 1 篇：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

1. 信息与经济学范式的变化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5
2. 行为经济学	马修·拉宾 58
3. 金融市场的实验：对资产定价理论的影响	彼得·博萨尔茨 91
4. 资产定价的两大谜团及其对投资者的影响	约翰·Y·坎贝尔 113

第 2 篇：宏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5. 宏观经济学何去何从?	佩里·梅林 151
6. 公共经济学的近期发展和未来展望	詹姆斯·M·波特巴 162

第 3 篇：国际贸易与发展

7. 关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理论和解释	科依勒·贝格威尔 罗伯特·W·斯泰格尔 179
8. 发展经济学有何新进展?	德布拉吉·瑞 204

第 4 篇：契约、法律与博弈

9. 契约还是战争？更宽泛地看待经济学中自我利益观的后果	米歇尔·加芬克尔 斯泰吉奥斯·斯卡珀达斯 227
------------------------------------	--------------------------

10. 法经济研究的新方向	艾伦·O·赛克斯	244
---------------------	----------	-----

人名索引		264
术语索引		277
译者后记		307

导 论

有一个故事，讲了关于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朋友的事情。他的这位朋友偶然听到有人说布莱克的诗支离破碎。这位朋友的回答耐人寻味：“是的。但那也是一种放射出光芒的破碎！”在这本书中，我们考察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中，年轻的学术带头人面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如何研究经济学的新方向。本书收录的论文代表了信息、贸易、发展、金融、商业、法律、博弈和政府等领域的发现和创新，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在科学进程的不同阶段不断发展演变。正因为作者们是以与前人不同的形式对现实和价值加以定义，从而提出新理论^[1]，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一些主要背景资料。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进程的描述，经过拉齐斯（Latsis, 1976）、拉卡托斯（Lakatos, 1977）和劳丹（Laudan, 1977）等人的改进，似乎可以刻画本书中所述内容的动态变化过程。库恩使用“范式转换”一词来描述“规范科学”实践变化的特征，而拉卡托斯使用“问题转换”来描述。这两种分类都是基于实证基础的，因为他们提出了各自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实质性问题（Laudan, 1977, 15, 77）。而这些问题关

2 注的正是如何将理论与现实相对应 (Bechtel, 1988, 53; De Marchi and Blaug, 1991, 2)。对于这两种分类, 另一个需要关心的是实践者如何解决问题。库恩关于“解决困惑”的观点陈述得非常清楚, 而拉卡托斯为解决问题而寻求“证明”的强烈愿望帮助他获得了关于转变的经验 (De Marchi and Blaug, 1991, 11)。这两种观点在对待异常问题上有些相似。库恩认为, 规范科学处理的是已经出现的问题。对一个范式或新方向的特别陈述“很可能被批判, 甚至被证伪并被遗弃; 但范式本身是不变的。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累积了足够的‘异常问题’” (Laudan, 1977, 73)。但是, 库恩和拉卡托斯也存在分歧, 特别是在对理性的处理方面。库恩非常依靠“品味或说服力”作为评价新方向可接受性的标准 (Bechtel, 1988, 57)^[2], 而拉卡托斯则通过波普尔 (Popper) 的理性视角看待变化 (Mayo, 1996, 274)。

奎因 (Quine, 1990, 13-14) 认为: “证明观点分类错误并不能完全驳倒假设, 而只是反驳了表达观点所需要的句子的连接词语。为了取消连接词语, 我们不一定非要取消问题的假设; 我们可以取消其他的连接句子。”这种方法现在被称为迪昂-奎因 (Duhem-Quine, DQ) “整体论”假设。该假设得到的经验是, 人们不能评估一个单一的假设, 而只能评估假设的联合分布。对于经济学家而言, 诸如此类的许多假设包括熟悉的条款, 例如核心要素、辅助理论和其他的假设、定义、统计设立、衡量标准、滞后结构、识别方法、误差项和边界条件等。这些假设使得人们难以拒绝朝着新方向发展的趋势。例如, 我们很容易改变“无数”假设中的任何一个, 从而使得一组假设不被拒绝。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对假设进行充分的改动使任何陈述都保持正确。因此, 库恩和奎因用同样的逻辑, 拒绝“分析—综合”概念, 这些概念通过实证发现作为新变化的向导来证明先验概念。对于库恩来说, 没有中性的语言来比较新老方向 (Bechtel, 1988, 56), 所以他靠说服的艺术来让人们接受特定的新方向。

库恩 (Kuhn, 1970) 积极地指出他和波普尔观点之间的相似性。库恩在他的比较中发现, 他和波普尔的发现都是理论性的。尽管他们都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积累发展壮大的, 他们针对变革可能发生的形式仍然存有分歧。波普尔 (Popper, 1962, 129) 认为, 科学“更多地通过变革而不是积累——是通过一种破坏、变革和改变整个事物的方法来成长壮大”。波普尔对科学变革采取一种相当宽泛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仅涉及到证伪, 而且也包括了过度满足、验真、客观知识、通过演变而发现以及情景决定论等概念 (De Marchi and Blaug, 1991, 2)。我们将通过拉齐斯的作品来重新考察情景决定论。